

单地 随感

张丰

2019年的春运已经开始,成都媒体像往年一样去火车站寻找新闻,发现根本没有过去的“紧张气氛”。其实全国各地都一样,回家的人,都已经习惯从12306或者微信上买票,已经不用再去火车站排队了。

甚至,是否还有那么多人“回家”都已成为问题。“发送旅客”的数量还会有增长,但是“旅客”和回家过年的人,不是一个概念。旅客的方向是多变的,越来越多的人,正在把春节当成一个普通的七天假期,计划到外地旅行。

节日当然和假期不同。小时候在农村老家读书,现在还没有到放寒假的时候,但是在腊八过后,就已经有了“年味”。看一下日历,已经过了腊月十五,用来蒸过年馒头的面粉都准备好了。这让人兴奋,因为家里的小麦并不够吃,已经吃了好一阵杂面馍了。

父亲应该已经准备好了过年的钱。三个孩子,每人一件新衣服,剩下的就是买肉和

菜,也就差不多花光了,但他还是想买一盘长长的鞭炮。这就是“节日”,在它到来之前,就会有漫长的准备,即便是穷人,也必须在节日里过盛大的生活。好像一年到头的辛劳,就是为了这几天似的,要全部展示出来。

节日的核心是仪式感。其实,所谓“仪式”,往往最没有实际用处。春联,焚香,还有说不完的祝福,这能起什么作用呢。亲戚之间充满热情地走动,似乎平常没有时间串门似的。最疑惑的,是复杂的拜年仪式,如果犯错,就一定会受到家长的责难,这常常让人感到尴尬。还有一些神秘的体验,比如蒸过年馒头或者炸东西的时候,在厨房里几乎不能说话,“熟了没有?”这样问一句就会被轰出去。一切都是神圣的,和日常生活不同。

最神奇的时刻,是正月初一上午10点钟。大家互相串门拜年已经结束,开始聚在一起闲聊。总会有人说一句:“啊,年已经跑远了。”即便是并不识字的农妇,也会从喜悦转入短暂的悲伤,每一个人都认识到“时间在流

逝”,都认识到自己又老了一岁,这真让人难过。这样的忧伤在众人的打闹嬉笑中转瞬即逝,却留在了我的心里。

我对和弟弟来说,最向往的是“起五更”。没有闹钟,但是远处响起的第一串鞭炮声唤醒我们。我们轻声唤醒对方(其实都已经醒来),偷偷穿上衣服,带上手电筒,就出门“拾炮”去了,把那些没有爆炸的鞭炮收集起来,然后剥开,把里面的炸药收在一起。这是男孩子喜欢的冒险游戏,突然有一年,我意识到这件事的无聊。弟弟唤醒我后,我没有起床。看他一个人出门去“拾炮”,我竟然有点难过。我看到了时光,也看到了兄弟将来注定会分离。

这样的体会,只有在节日里才能有。春节本质上是农业社会形成的习俗,和农业生产息息相关。人们祈求风调雨顺,亲戚的走动,其实也是为了来年耕种的合作。在走向城市化的过程中,“节日的崩溃”似乎不可避免。人们已经知道,烧香不会影响天气,还不如跟着天气预报的节奏走。随着机械的广泛使用,一

个老农可以应付过去一家人的耕地,亲戚的走动也似乎失去了动力。

人们被短片《啥是佩奇》感动,真是意味深长的一幕。除了老农寻找“佩奇”外,这个短片还有一个潜在的故事:儿子和孙女一起回老家,接老农到城里过年。不是“在农村”,也不是“在城市”,而是“回农村接父母到城市”过年,这是一种新的过年方式。对老年人来说,到城市过年绝对不是好的体验,那意味着和过去的生活经验完全无关,而“过年”本质上就是和过去有关的。

进城去看《小猪佩奇》,那不是过年,勉强算是“度假”。最近二十年来,伴随着“节日衰落”的,是“假期”的兴起。假期是工业社会的概念,人们日复一日地上班,需要一个较长的假期放松下来。二十年前,春节期间去旅行,不仅前卫,也意味着“不方便”,因为人们都在“过年”,服务业处于半停顿状态。如今,春节对很多行业来说,已经成为真正的“旺季”。

“假期”概念正在取代“节日”,对少年来说,这没什么问题。困惑和不安,属于像我这样拥有乡村和城市两种经验的成年人。即便是高兴兴度假,也总觉得缺少了什么。那个叫“年”的东西,到底是什么,总是是心头的一个问题。

单地 世间

陆波岸

在我的记忆深处,故乡的年是扳着手指一天挨着一天盼来的,扳着手指盼来了这个年,又扳着手指盼着下一个年。尤其是临近年关,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,每天都在寒风萧瑟中期盼酒肉飘香的喜庆年。

我的故乡在桂西北,每年进入农历十月,父老乡亲就在呼呼的寒风里,期盼着暖暖的年,他们上山砍柴,喂养年猪,酿制酒水、置办年货……每一天忙碌的脚步,几乎都奔向年的方向。

这个时候,地里的红薯熟了,乡亲们纷纷收割红薯苗,翻犁土地,把红薯一担担从地里挑回来。晚上,他们不願白天的劳累,挑起灯火,将红薯洗净砍碎煮熟,该酿酒的酿酒,该喂猪的喂猪,忙碌的身影在一片片夹杂着浓浓草味的火光里摇曳,灿烂的笑容在一阵阵蒸腾着浓浓红薯香味的水汽里绽放,整个山村的夜晚都在期盼年的烟火和气味里徜徉。

自古以来,在乡村,都把一头又肥又大的年猪看成是喜庆富足年一个重要的象征。谁家的年猪养得好养得大,说明这家人勤快运气好。因此,喂养年猪是他们的头等大事。煮有了把这头精心喂养的年猪宰杀,大锅煮肉,大碗斟酒,大声欢庆的那一刻,他们整整一年的期盼,才算稳稳当当安放在心头,无限灿烂绽放在脸上。

有一年,父亲为了把家里的年猪喂得更好,带着我走了六个多小时的山路到一个集市去买木薯粉。我们挑着木薯粉往回走,离家还有一个小时的路程天就黑了,只好向路边人家找干竹子当火把,一手举着火把一手握着扁担,在寒冷的夜风里深一脚浅一脚赶路。那一年,我才上小学五年级。

我的故乡处在巍巍大山之中,自古交通不便,物质贫乏。每当寒风吹着腊月日益临近,祖母总是坐在烟火缭绕的火塘边,眯缝着眼睛一边烤火取暖一边唱起古老的壮语歌谣。大意是:寒冬腊月冷风嗖嗖,眼看春节来到前头,富贵人家杀猪腊肉,贫寒门户百样忧愁。幽幽的唱词里,道出了一样的人间、不一样的滋味,道出了这方土地一样的年关、不一样的滋味。

有一年,我在快到年时回了一趟家。一大早,还在床上迷迷糊糊睡着懒觉,一位亲戚赶着早路已经登门来访。他在火塘边和我母亲诉苦说,他家最近油盐问题很棘手,本来想家

扳着手指盼年来



回家过年

新华社发 张柯作

里存的油是可以熬到杀年猪的,没想到还差十来天油缸就见底了,现在要去买又没有钱,一家人没一点油实在难过,问我母亲能不能借点食油给他,帮助他一家人年前这段艰难的日子熬过去。

那时候,我家刚办完祖母后事,还存有一些柴米油盐。我听了这位亲戚唉声叹气的诉苦,一股说不出滋味的心酸阵阵涌上心头,赶紧披衣起床做饭招待他,然后让母亲打了两斤多的猪油送给他,让他带回去跟家里人把这个年关熬过去,并一再告诉他这点油就不用还了。

十几年过去了,那情那景常常不由自主浮现在我的心头。每当临近年关,父老乡亲们的笑脸愁容会像影片一样,在我的脑际轮番播

放,打心眼里希望他们这一年能多收一些粮、多养几头猪、多赚一点钱,过年杀猪能多存几斤肉几斤油,到年关不用这么煎熬。

为了让日子过得没那么煎熬,很多乡亲都要背着行囊,穿越巍巍大山,到城市的茫茫人海中去找生计。他们不少人常常大年初五就得得出,到年关不用这么煎熬。

我还小的时候,二姑丈就已经远离家门到广东谋生,用他半辈子的辛勤汗水支撑起一个家。直到今天,他还在那里为生活打拼。在这二十多年时间里,他只有临近过年才能回家,还没到元宵节又得出去了。每一年,我都请他路过我工作生活的城市时到家坐坐,由于来去匆匆,好多年都没有如愿,我们也因此常常两三年都见不着一面。

70后的过年记忆

盖脸打一顿的孩子,每逢春节到来前,胆子也大了几分,哪怕再闹腾,换来顶多是家长骂一嘴,打是不会挨的了。

这大约继承了农耕社会的传统:过年的时候不能生气,要吃好的喝好的,大人孩子都要尽情玩耍,见人要说喜庆话,哪怕日子过得窘迫,就算装也得装出个得意满满的样子,大过年的,没人愿意看到谁长着一张黑脸。种了一年地,受了一年苦,年底盘算收成时就算不理想,也得咬咬牙把一口气咽了,等过了年,再去卖力气,再去拼。

所以,农村孩子盼过年,除了盼一个热闹外,隐约也盼的是,能够有一个正常的、温馨的、友好的环境。在这个环境里感受到爱、欢乐、安全感。发明春节的祖先们有先见之明,立了种种的规矩,因为这些规矩都是盼着人好,所以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都被很好地传承了下来……现在大城市里不还流行一句话,“有钱没钱,回家过年”。每逢春节临近,一线大都市的火车站,就塞满了乡愁,平时在写字楼里互称英文名的白领们,又变成了回乡过年的秀娟、阿香、建军、建国……

我也是回乡过年大军中的一员。童年过春节的记忆,已经渐渐模糊了,但过年的兴奋心态还是有的,骨子里的基因也决定了,快过年的时候脸上要喜气洋洋,要对孩子尽量友

好,把零花钱给足,宠着点儿也没关系,因为童年的时候,祖辈、父辈的人就是这么对待我们的。

童年春节印象最深的三件事,一件是放炮仗,一件是拜年,还有一件是看舞狮子。对于孩子来说,放炮仗是过年时最刺激、也是最符合“合理捣乱”范围内的一件事了。村里供销社,早早地就进货了,离春节还有大半个月,就没停过爆竹声响,土路上就没缺过一片大红的爆竹皮。很少有孩子正经放爆竹,都是变着花样放,最常见的就是往粪坑里扔炮仗,炸得满墙、满地都是大粪,事惹大了,避免不了被大人揪住象征性地踢几脚。还有一种放炮仗的方式,就是每人手里捏一只炮仗,喊声“一二三”之后点火,然后拼谁胆大,最后把炮仗扔出手的那个孩子,是“英雄”,就是这样,每年村里都有某个孩子的某根手指,被炸肿或炸裂了。

拜年是一个孩子最简单直接获得收入的渠道。先给直系亲属拜年,后给没出五服的家族长辈拜年,最后给村里走动较多的邻居拜年,无论给谁拜年,孩子们都很直接,过过年话,不用说,一个头磕下去,人家就懂了,一个红包就塞进手里或口袋里,红包里装着从五毛到五元不等面值的钞票,没红包给的,就塞一把花生或者糖块,大年初一一整天下来,每个

有一年,我们在老家谈心时,他推心置腹对我说,他在老家建了一座房子,花了差不多十年心血才把建房的债务还清。但这十年里,总共在家住不到一年的时间,“我每年回家时间不到二十天,十年在家最多就是两百天。”听了他的话,我顿时一阵心酸,感慨万千。

这片大山有着无数个像我二姑丈这样为生计而在外奔波的人。因此,乡亲们的盼年神情里,更多一分相思的煎熬,多一分团圆的期盼。年关临近,在外的人扳着手指数日子,期盼着早日踏上归途,回到父母妻子儿女身边;在家的人也扳着手指数着日子,等待远方亲人家日归来,在暖烘烘的火塘边,温暖着一年的别离,温暖着来年的梦想。

少年不识愁滋味。在盼年时光里,孩子们是最开心最快乐的。男孩子会缠着大人上山把坚硬的木头砍回来,削制陀螺,编制绳子,用新绳子绑着新陀螺挂在腰间,一副天下无敌的模样,到处找人挑战。有时候,他们成群结队在山间玩耍,一听到大人叫喊帮忙赶紧着从山上跑下来的牛羊回家,立即哼着不着调的曲子,用袖子把鼻涕往两边耳根一抹,呼啦啦地跟在成群牛羊后面奔跑,欢快无比。女孩子常常是结伴踢毽子、蹦蹦跳跳,马尾巴辫在寒风中左右摇摆上下飞舞,银铃般的笑声洒落在山间的每一个角落,给大山沉寂的寒冬带来无限的生机与欢乐。

他们玩累了,会聚在一起扳着手指数着还有多少天就可以过年,告诉同伴过年自己家里会有什么好吃的。或者缠着大人,不厌其烦地问在外的父亲什么时候能回来,家里的年猪什么时候可以杀,甚至在梦里不止一次吃上一顿热气腾腾的新鲜猪肉和猪龙棒。醒来时才发现,自己正在啃着手指头,口水流了大半个枕头。特别是我小的时候,山里缺油少盐,只有到了过年才能好好吃上一顿饭,我年少时对年的期盼基本上就是对吃肉的期盼。

猪龙棒又叫猪血肠,是用猪伴着玉米粉或者大米饭粒,灌入猪肠子煮熟而成的一种食品。在我故乡那片大山,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,只要杀猪,猪龙棒是必吃的美食,几乎是每一个人都无法抗拒的诱惑。你家杀了猪,客人上门来吃不上一节猪龙棒比吃不上猪肉还不高兴。家里杀猪,小孩吃不上猪龙棒要肉吃不喝连哭带闹三天三夜。大人要鼓励小孩好好读书,往往会说,“你好好读书,考试考好了,过年杀猪奖励你一节长长的猪龙棒,挂在脖子上可以大绕三圈都绕不完。”

直到今天,我对猪龙棒的美味依然无法抗拒,不管是小饭馆还是车站周边的小食摊,只要见到一定要好好过把瘾。每当手里拿着猪龙棒慢慢品尝,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故乡的年,想起故乡年里许许多多的人和事。

孩子都成了小小的富翁,要赶在父母把压岁钱收去“代管”之前,能挥霍多少就挥霍多少。

孩子花钱的地方,要去县城里,春节期间的娱乐活动,集中在县城中心繁华地带,人群挤得像个麻绳疙瘩,但大家都不嫌弃,觉得有这么挤,才有过年的劲儿。除非有一种,舞狮队过来的时候,人群会一下子散开,不敢不散开,为了欢迎舞狮队,每家单位都会点燃一串大炮仗,被炸到就不是小伤,另外,舞狮人当中那个藏在狮子肚子里的家伙,有时也会犯坏,被他蹬上一脚,也够受的。最大的舞狮队有几十号人,除了大大小小的狮子,还有划旱船、骑马驴、踩高跷的表演,怎么看也看不够,通常会有会有一些孩子从头跟到尾,一直到快天黑时才恋恋不舍地回家。

至于穿新衣、吃美食,这在孩子的春节生活当中,就不算什么大事了。相比于物质供给上的富足,孩子对过年的最大需求,其实是精神满足,只要能开心地玩,其他都不算什么。这是我很久之后才明白的一件事。都说现在孩子们过春节觉得没意思,不在于红包越来越厚,也不在于能够往有花有海的南方飞,而在于现在的孩子,已经不能像从前那样,放肆地疯玩,在一个开阔的空间里,与整个社会建立起某种联系了。

作为一名70后,已经在这个世界上过了四十多次春节的日子,想告诉那些愿意把春节过得有意思一些的朋友们,春节最好的过法,是让自己的情绪饱满一些,忘记一年来的辛苦与烦恼,像个孩子那样,投入地、开心地玩起来。

单地 原乡

王宁

从县城回老家路有两条,一条从黄河故道的河堤顶上过,村南进村;一条从河堤下沿过,村西进村。

黄河,这条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母亲河,千百年来,也给下游人民带来了无数危害与灾难,有历史记载的大改道就有1500次以上。

黄河改道后留下的地貌有三种:荒芜的盐碱地、水草丰美的湿地、尚存的河道。这三种地貌在民权县境内都有呈现。以黄河故堤为界,堤南是高滩地,即胶泥地,土质粘硬,适合农作物生长,老家胡寨村就在堤上。县城在堤北,属沙碱地。小时候去县城,通常走村南的路。

这条路有30多里,前半段在故堤之上,道路结实平整;后半段在堤下,是泥青路,虽然也是坑坑洼洼,但总归是硬化过,相对好走一些。村西的路则要走堤下,穿过长长的中甘林带。林中小路沙质松软,走起来非常艰难,但路程稍近一点,有20多里地。

1978年,大姐和哥一起考上大学,我和二姐还有两个妹妹,陆续离开农村,到县城跟着他们上学。那天下午,第一次离开父母、离开村庄,骑辆二八式大自行车,跟在大姐后面,兴致勃勃地去县城上学。

二八自行车,对十二三岁的孩子来说,太高太大,够不着脚蹬,只能用脚尖勾着,左一下、右一下,晃动着身体奋力骑行。

路上要经过好几个村子。村庄里的路面比较平整,还好走一些。出了村就疙疙瘩瘩的,蹬得屁股疼,双手虎口也疼,骑个四五里地就坚持不住了,央求大姐下来歇歇。

一路上,大姐用了各种方法哄着我向前走。看看她车座上的面袋子,觉得有道理,不再作声。骑到大姐宿舍门前,已经四肢僵硬、无法动弹了。

家里、县城,来来往往,走得多了,30多里的路程不再那么恐怖。

那时每到麦收、秋收季节,学校都会放假,家在农村的学生都要回去干活。有年麦假,准备回家时,嫂子让给爸妈捎两个西瓜。哥嫂把两个西瓜装进布袋里,扎上口,抬起来挎在后座两侧。

一路小心翼翼地拣着平整的路面走,还好。到一个村里,路上突然有许多积水,很深,自行车推不过去。站在积水前,不知如何是好,大为得想哭。

西瓜又沉又不安稳,很怕自行车陷在水里,或者连人带车一齐摔倒。等了很久,一直没有村民经过。后来灵机一动想出个办法:把西瓜先卸下来,推车过去,然后再回来抱瓜。那时的西瓜都很大,每个都有一二十斤重。

推着自行车,紧贴着墙根,踩着松软的稀泥,一步步挪出积水。西瓜抱回后,装进布袋,扎上口,一只胳膊托起一个,使出了吃奶的力气,才重新跨在后座上。

刚出村,路上竟然又出现一条浇地挖的水沟。水沟虽窄,抬腿就过,自行车前轮也能推过去,但后轮不行。只好再次卸西瓜。几次想把西瓜放下,但想想在地里辛苦劳作的父母,又舍不得。那年家里没种西瓜,大热的天,爸妈肯定不会买,这两个带回去,也许是个小小的惊喜。

除了辛苦,在这条路上,还有一段生死劫。

那是周日的下午,和同学一起,骑着自行车,从老家回县城上学。傍晚时分,快到县城的时候,对面一辆大卡车突然超车,呼啸着快速驶来,我和同学赶快躲到马路边。同学在前,我在后,卡车紧贴着我们轰鸣着全速行驶。感觉自己像个小孩,还没车轮高。这车厢真高,车轮过了一排又一排,有四五排之多。时间因恐惧显得格外漫长。终于快过去了,还没等松口气,挂在后面的一节长长的车厢又闪现出来。惊恐地躲避,但躲无可躲,向外拐时,感觉自行车前轮被同学的后车轮轻轻挡了一下。

之后的片刻,脑袋是空的,只听见半空中传来一声尖锐、辽远的喊叫声。心想:这声音好高啊,平时自己是个发不出来的。重重摔在地上,慢慢睁开眼,才意识到这是个世界。

也许是听到了这凄厉的叫声,卡车立刻停了下来。司机开门,跳下车,走过来,看看自行车,看看我,一句话不说,一副淡定漠然的样子。这时才发现,自行车前轮被卡车碾压而过,严重变形。幸亏自己倒向外侧,否则早已血肉模糊。同学醒过神,把我扶到路边。我靠在树边瑟瑟发抖。过路的人走了一拨又一拨。终于有个本家路过,说他抓紧回去城里,让家人来接我。

当一线弯月从漆黑的夜幕中闪现时,哥、姐骑车匆匆赶到。他们看我还能站着,暗暗松口气。之后采来医院检查,回家休息。周日的下午,步行回学校上学——车是不敢骑了,独自走在马路边慢慢走着,恍如隔世。身后突然传来卡车刺耳的喇叭,感觉就要被撞到了,吓得一下跳到路边的杨树后面。这才意识到,是车祸的后遗症。

第二天上课前为全班领歌,嘶哑的歌声一出口,我立刻想起那声凄厉的尖叫,眼泪立刻流了下来。这是车祸后第一次流泪。此后一个多月,不敢走马路。

走村南的路,远、累,也有危险,便尝试走其他的路。有次骑车带着妹妹去县城,选择了村西头的那条路。

出村,穿过一片田野,河堤下面,便是著名的中甘林带。中甘林带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,是豫东防护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,也是当时全国平原四大、亚洲十大人工防护林之一。

一进树林,骑车立刻艰难起来。林带边沿,路面较硬,一个人还能骑得动,再坐上去,就很费劲,只有弓着腰,抬起屁股,把全身重量都压在脚踏板上。

越走路面越松软,沙坑也越多。一有沙坑,小妹就得跳下来跟在后面跑。有时候只好下车推着走。小径上留下两条细细的、深深的、曲里拐弯的车辙印。

树林深处的杨树、槐树,高大、挺拔、茂盛,午后的阳光在树林间斑驳地闪烁着,一片静谧、幽深的世界。又累又渴又饿,但不敢停歇。这蜿蜒悠长的树林小径,怎么走也走不到头。路上看不到一个人。不知过了多久,终于看到一户人家。阳光照耀在爬满青藤的门楼上,门前坐着一位慈祥的奶奶。

我像遇到了救星,赶紧下车。奶奶打量着我们,微笑着说:“不远了,快到了。”

20多里的沙路,走了四五个小时。午饭后出发,天黑透了才赶到县城。

人渐渐长大,来回走的次数多了,虽然也是累,但不那么恐怖。

后来,从村南进城的路修成了柏油路。

后来,从村西进城的路也修成了柏油路。

回家的路越来越平坦,回家不再艰难,20分钟就到。

后来,工作的城市越来越远,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,但心与家的距离却从来没有疏远。无论旅居在哪个城市,无论行走在怎样的异乡,回家的路,永远愉快而温暖。

故乡就像漫漫旅途中的加油站,带着沉甸甸的充实和满足,我们从村南回城。走到黄河古道的石桥上,一轮硕大的、橘红色的太阳正好落在不宽的河面上,把云彩和河水染得鲜红、鲜红。

单地 生活

韩浩月

去年的春节感觉没过去,又到新一年的春节了。大人与孩子心目中的春节最大的不同在哪里?答案是:大人害怕过春节,不喜欢那种“转瞬又一年”的感觉,而孩子盼着过春节,一年盼到头,觉得时间特别缓慢。

作为一名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人,有了童年记忆,刚好是进入了20世纪80年代。这时,农村人开始能吃饱饭了,久违的白面、大米,慢慢重新回到普通人甚至贫困户的餐桌上,逢年过节,家长们也能割几斤肉回来给孩子解馋了。

因此,对于过年这件事,70后恐怕要比80后、90后的人有更深的感触:物质匮乏时代的年,才更有年味——这句话貌似矛盾,但事实的确如此,也正是随着日子越过越好,人们才觉得年味越来越淡的,反倒是碗里有块肉就能幸福好几天的日子,过年才有节日的气氛。

我对过年的印象,还不只是那些丰富的吃食、欢乐的庆祝活动,而是那种过年的氛围,尤其是家庭情绪,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:平时脾气暴躁的家长,临近过年的时候,脸上有了笑模样,而整日爱唠叨的大人,虽然还少不了唠叨的毛病,但语音里明显多了些欢欣……那些平时因为调皮被呵斥甚至劈头